

家庭背景、族群身份与 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

谭敏¹，谢作栩²

(1. 福建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福建 福州 350001;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基于对全国 175 所高校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 分析其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对我国少数民族群体进入不同类型高校机会的影响, 结果发现: 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受社会分层与族群分层结构的双重制约。从家庭背景的角度来看, 总体上家庭背景愈佳, 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多; 从族群身份的角度来看, 在控制家庭背景变量的情况下, 少数民族学生较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层次的教育机会。

关键词: 高等教育获得; 族群身份; 少数民族; 家庭背景

中图分类号: G7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1)10-0050-09

Family Background, Ethnic Identity and Chinese Minorities' Acqui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AN Min¹, XIE Zuo-xu²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b-data questionnaire drawing from "Research Databa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ethnic identity on Chinese minorities' acqui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ese minorities' acqui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restricted by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thnic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amily background, minority families with good background are good at opera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s to create benefit condition for their offspring's acqui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thnic identity, students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dmitted by common universities as long as with similar family background, but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admitted by key universities and non-state-run colleges.

Key words: acquis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thnic identity; minority group; family background

① 收稿日期: 2011-09-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880011)

作者简介: 谭敏(1982—), 女, 吉林白山人,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 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谢作栩(1950—), 男, 福建仙游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各类型高校的入学比例却一直未能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1];另一方面,近年来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实施的高考加分、预科班招生等倾斜政策面临诸多争议,持反对意见者认为现实中那些处于相同社会经济地位、接受相同中小学教育的汉族成员的高等教育权益被“逆向剥夺”,并质疑当前形势下实行这种“差别对待”的必要性。若要正确看待这些现象与问题,就有必要以实证的方法了解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真实面貌。

一、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同民族对某些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的获取存在较为普遍的差异。在看待和分析这些差异时,社会学者往往对社会分层和族群分层结构的影响力持有不同的意见。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科尔曼在其研究中发现,影响黑人和白人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因素并不是种族歧视问题所导致的资源投入不平等,而是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异所致。^[2]费吉恩的研究则将以色列裔学生与亚裔、白人、黑人学生进行比较,以裔学生学业成就之所以最高是因为其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及家庭收入),其中父亲教育程度影响最大。^[3]而更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衰落的种族意义》中对种族与阶级的探讨。^[4]他认为,美国民权运动之后黑人中产阶级的扩展已导致“逐步加深的经济对立”,“贫穷的黑人与中等和上等收入的黑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因素已成为黑人生活机会的主要影响因素。黑人内部的分化加剧,黑人中产阶级成为种族障碍消除的受益者,经历了实质性的向上流动,贫穷的黑人与中、上收入的黑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底层黑人的经济状况难以有明显改善,使得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获取教育机会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以家庭背景为指标的阶层分化,其中少数族群内部的阶层分化同样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很多学者赞同威尔逊的观点,但对其轻易放过族群因素的持续影响颇有争议。族群分层的基本观点认为,除了家庭背景之外,人们还会因其族群身份

而划分等级,通常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总是重合。^[5]如梅汉等人认为文化、社会地位团体和学校科层制度共同作用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6];赫斯认为集中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文化资本使其能更容易取得学业成功,而语言交流类型不利和缺乏文化资本的低阶层白人和黑人家庭子弟则面临更多的学业失败。^[7]这些研究说明,如果族群之间对教育机会的竞争存在着群体性的结构性差异,并且该差异达到一定显著程度就形成了以族群为基准的分层状态,这时就应额外关注族群身份及附属因素,如族群文化、族群政策等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

实际上,造成族群间教育机会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具体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会因环境或国情的不同呈现不同的特点,应该综合考察不同民族文化或体质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或是民族歧视制度等诸多方面。正如科普林等人在谈及美国的情形时所表达的:“社会阶级的影响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至不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讨论民族问题将毫无意义。此外,不考虑民族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对美国阶级体系所作的分析也是不完全的。也许社会阶级和民族的交叉分析,为系统全面地理解美国社会分层的本质提供了最有成果的方向。”^[8]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较多地关注了族群文化对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家庭背景分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阶层分化的影响。仅有个别研究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如滕星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成员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分化,各少数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差异与地区差异的扩大,可能导致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同一少数民族内部(入学机会)出现了较大差异。^[9]谢作栩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10]但目前尚无深入的实证研究证明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综合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如何综合地影响我国社会成员的高等教育获得?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影响是否有其特殊性?针对不同家庭背景成员的利益取向与资源获得状况对少数民族群体这一特定群体获得各类型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本文尝试提出一些理论假设:

假设一：家庭职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背景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城镇家庭背景等对少数民族子女获得更高层次教育、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二：家庭背景因素与族群因素将共同影响各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家庭背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类似。

假设三：同等家庭背景条件下，汉族学生可能较少数民族学生更容易获得更高层次、更好质量的高等教育。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参与设计实施的厦门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中《大一新生调查问卷》。我们于2007年9月—2008年6月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177所高校的大一学生发放问卷55595份，共返回问卷48143份，回收率达到86.6%。剔除无效样本后，有效问卷共47170份，有效率达97.9%，其中汉族样本41706

份，少数民族样本(不包括未识别民族)4682份，占9.9%。

数据分析采用的是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考察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上述假设，分别就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层次与质量进行分析，具体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别建立三个模型，模型1包括了所有样本，反映的是家庭背景对所有样本(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平均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反映家庭背景对汉族样本和少数民族样本的影响。

本研究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因变量定义为两类：一为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高职高专院校为基准($Y=0$)；二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211工程”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一般本科院校为基准($Y=0$)。自变量除了包括父母所在职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状况、家庭居住地等基本家庭背景变量，还引入学生性别、民族等变量，用以综合考量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名	赋值	含义
院校层次	0	高职高专(包括公办高职高专、民办高职高专)
	1	本科院校(包括“211工程”院校、一般公办本科院校、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
院校质量	0	一般公办本科院校
	1	“211工程”院校
民族	1	汉族
	0	少数民族(不包括未识别民族及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性别	1	男
	0	女
家庭居住地类型	1	城镇(包括省会或直辖市、地级市、县城和乡镇)
	0	农村
父母所处社会阶层 (以社会阶层较高一方为准)	1	优势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
	2	中间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
	3	基础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林牧渔人员、失业半失业无业人员)
父母受教育程度 (以教育程度较高一方为准)	1	高等教育程度(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程度)
	2	高中教育程度(包括高中、中专教育程度)
	3	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
家庭人均年收入	1	高收入家庭(家庭人均年收入40001元及以上)
	2	中等收入家庭(家庭人均年收入10001—40000元)
	3	低收入家庭(家庭人均年收入10000元及以下)

四、数据分析结果

1. 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

机会的影响

为了解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本文建立了表2中的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代表家庭背景对总样本、汉族样本和

少数民族样本以“高职高专”为参照进入“本科院校”的影响。

表 2 家庭背景对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以高职高专教育为参照)

	模型 A1 (总样本)		模型 A2 (汉族样本)		模型 A3 (少数民族样本)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常数项	1.239*** (.047)	3.453	.809*** (.025)	2.245	1.340*** (.074)	3.819
父母职业阶层(参照组:基础阶层)						
优势阶层	.009 (.054)	1.009	.037 (.057)	1.038	/	/
中间阶层	0.373*** (.042)	1.452	.404*** (.044)	1.498	/	/
父母文化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0.582*** (.043)	1.790	.045*** (.045)	1.853	.368*** (.114)	1.445
高中教育程度	-.007 (.028)	1.007	.004 (.029)	1.004	.072 (.101)	1.075
家庭收入(参照组:低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246*** (.064)	.782	-.270*** (.066)	.764	/	/
中等收入家庭	-.079* (.033)	.924	-.096** (.034)	.909	/	/
家庭居住地(参照组:农村)						
城市	.151*** (.029)	1.163	.175*** (.030)	1.191	/	/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	.149*** (.025)	1.161	.144*** (.026)	1.155	.226* (.090)	1.254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汉族	-.419*** (.046)	.658				
Chi-square	815.546***		734.383***		17.028***	
-2 Log likelihood	39672.798		36290.108		3352.716	
样本数	36746		33130		3616	

注:显著水平*** \leq .001;** \leq .01;* \leq .05;表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数据库 www.heddb.xmu.edu.cn。

(1)家庭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从进入各个模型的影响因素来看,家庭背景因素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有背景因素对汉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只有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生性别因素明显发挥了作用。在

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相比,前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由专科提升为本科的概率较小,概率比为 0.658。

(2)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在模型 A1 和模型 A2 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但对少数民族子女

并无显著影响,被剔除在回归方程之外。

(3)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在所有模型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进入本科的机会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程度父母与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父母之间的差异。从全部样本来看,当父母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上升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比将增加 1.790,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样本也存在类似情形,即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其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本科院校,但从二者的系数和概率比来看,家长文化程度对汉族子女的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

(4) 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

家庭收入对子女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与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类似。即在模型 A1 和模型 A2 中,家庭人均年收入虽有一定影响,但对少数民族子女影响并不显著,被剔除在回归方程之外。

(5) 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家庭居住地对少数民族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总样本和汉族样本影响显著,即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

(6) 性别的影响。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男女在校大学生就读本科院校的概率有明显差异,总的来说,男性学生比女性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其概率比为 1.161,而少数民族学生的性别差异要大于汉族学生的性别差异,即少数民族女性学生较之汉族女性学生更难就读本科院校。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控制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后,分析表明少数民族学生较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模型中所有因素对汉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只有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生性别因素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父母文化程度对汉族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影响大于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而性别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则大于对汉族学生的影响。

这些意味着,在家庭背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本科院校的机会不仅没有少于汉族学生,反而更具优势,族群因素并未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障碍。从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因素成为制约其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显著性要素,父母学历较低的学

生以及女性学生相对较难获得本科教育机会。

从我国目前汉族与少数民族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层次来看,虽然少数民族接受本科教育的比重高于接受专科教育的比重,但都依然低于其人口比重,这说明少数民族无论接受专科还是本科教育的机会还依然低于汉族学生。而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族群因素并非影响少数民族本科教育机会的不利因素,这说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相对不利仍然是少数民族由专科向本科教育层次跨越的重要障碍。而从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来看,还应进一步消除父母教育程度以及性别因素对文化资源匮乏家庭的子女以及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的不利影响。

2. 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之后,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但是如果进一步将本科院校划分为一般本科院校^①和“211 工程”院校之后,是否依然存在类似情形。

(1) 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的综合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三个模型中将家庭收入的影响剔除,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家庭经济收入无论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211 工程”院校都没有显著影响。反之,父母所在职业阶层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则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子女都有显著的作用力。对汉族学生来说,城市家庭的、男性学生更易进入“211 工程”院校,而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性别和家庭所在地因素被剔除在模型之外。此外,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汉族较之少数民族的学生,前者进入“211 工程”院校的概率显然更高,概率比为 1.173。

(2) 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

父母所处职业阶层对其子女能否进入“211 工程”院校有显著影响。对汉族学生来说,中间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最高,概率比达到 1.263;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进入“211 工程”院校的机会并无显著差别,但中间阶层子女的概率比显著高于基础阶层,而且高于汉族子女的概率比。这说明,无论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来说,父母的中间阶层地位会显著影响其子女能否就读更高质量的公办院校,而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一些。

(3)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表 3 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本科院校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在模型 B1 中,父母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比父母为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高出 88.2%。对汉

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分别考察也存在类似情形,即随着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进入“211工程”院校,父母文化程度在其子女进入高质量院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二者的系数和概率比来看,家长文化程度对少数民族子女的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对汉族子女的影响。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

城乡居住地对少数民族子女跨入“211工程”院

校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总样本和汉族样本影响显著,即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更有可能接受更高质量的公办本科教育。

(5)性别的影响。

与家庭居住地因素的影响类似,性别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就读“211工程”院校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总样本和汉族样本来看,男性学生比女性学生更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

表3 家庭背景对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以一般公办本科教育为参照)

	模型 B1 (总样本)		模型 B2 (汉族样本)		模型 B3 (少数民族样本)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B (系数)	Exp(B) (概率比)
常数项	-1.285*** (.049)	.277	-1.159*** (.034)	.314	-1.082*** (.067)	.339
父母职业阶层(参照组:基础阶层)						
优势阶层	.179*** (.062)	1.195	.188** (.065)	1.207	.135 (.186)	1.144
中间阶层	.244** (.044)	1.277	.234*** (.046)	1.263	.333*** (.126)	1.395
父母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602*** (.043)	1.826	.599*** (.050)	1.820	.663*** (.130)	1.941
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	.212*** (.035)	1.236	.185*** (.037)	1.203	.445*** (.101)	1.560
家庭收入(参照组:低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	/	/	/	/	/
中等收入家庭	/	/	/	/	/	/
家庭居住地(参照组:农村)						
城市	.193*** (.035)	1.213	.209*** (.037)	1.233	//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	.489*** (.029)	1.631	.545*** (.031)	1.724	/	/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汉族	.160*** (.045)	1.173				
Chi-square	896.742***		829.727***		76.037***	
-2 Log likelihood	27491.507		24218.178		3233.976	
样本数	21421		18815		2606	

注:显著水平*** ≤ .001; ** ≤ .01; * ≤ .05;表中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数据库 www.hedb.xmu.edu.cn。

综上所述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之后,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但是如果将样本控制为公办本科学历层次之后,汉族学生仍然较少数民族学生更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这说明少数民族在进入重点本科院校时,可能面临着家庭背景和族群属性的双重不利影响,补偿性招生政策对进入重点高校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其精英性质仍主要以学业成就为基准,使得家庭背景和族群身份的反向作用力显现出来。从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来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所在地和性别因素并没有独立的显著影响,但父母文化程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引起额外重视,而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较基础阶层的少数民族子女更有可能接受高质量的公办本科教育。

五、发现与初步解释

1. 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影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一般态势

以上分别从在校大学生就读院校的层次与质量两个方面分析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对照研究假设,我们认为:

假设一得到了部分证实。家庭职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背景等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但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变量对少数民族就读何种院校的影响力并不相同。比如,父母所在职业阶层对少数民族学生就读本科院校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其是否获得重点本科及民办高等教育机会会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最为突出,且基本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子女获得本科教育、高质量教育及民办高等教育的机会都会有所提高,同时该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大于对汉族学生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少数民族能否就读本科院校和“211工程”院校无独立的显著影响,但家庭收入状况与少数民族子女进入民办院校的概率呈正比;家庭所在地对少数民族是否进入民办院校有显著作用,即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有可能接受民办高等教育。

假设二得到了部分证实。家庭背景因素与族群身份确实共同影响各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家庭背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仍有一些差异。几乎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对汉族子女就读各类型高校都有显著影响,但其中只有部分因素对少数民族子女产生独立

性影响,且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

假设三得到了部分证实。在同等家庭背景条件下,汉族比少数民族更易进入“211工程”院校,但在进入公办本科院校的概率上少数民族学生似乎更具优势。

2. 汉族与少数民族子女获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将各种家庭背景变量控制之后,少数民族比汉族学生更易入读本科院校,但是在就读“211工程”院校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这说明在高等教育选择的过程中,除了基本的家庭社会文化经济地位的影响外,民族特性本身也可能成为促进或阻碍个体进入不同类型院校的重要因素。

我国长期实行高等学校入学的少数民族补偿政策,如优先录取、高考加分、单独招生、预科制度等等。这些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少数民族学生可能的先天不利,为保障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措施的协助下获得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从分析结果来看,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学生中少数民族更易将就读层次由专科提升为本科,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补偿政策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政策的作用尚未能扭转少数民族学生在就读更高质量的重点院校所处的不利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重点高校的分布状况、招生政策与生源特点决定的。

我国专门承担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任务的民族院校大多为非“211工程”院校。在2009年1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112所“211工程”院校名单中,大部分院校处于东部发达地区。其中,北京就有20余所,而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八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一共只有9所“211”高校,仅占总数的8%,重点院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覆盖率相当狭窄。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仍然是向本地生源较大幅度倾斜,致使总体招生名额分配严重向所在地和东部大中城市倾斜。如2006年,清华大学在京招生328人,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却仅为249人,占该校招生总数的11.8%;北京大学在京招生692人,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也仅为243人,不到招生总数的9.47%;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2509人,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仅为172人,不到招生总数的4.28%。各重点高校对少数民族省区的招生计划明显低于东部地区。^[11]也就是说,开放给少数民族学生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地处高等教育薄弱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学

子尚未参与竞争就已经失去了就读重点院校的平等机会。同时,少数民族招考补偿政策也有一定影响,不同省区制定的少数民族补偿政策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仍然是报考民族类院校、本地区高校、预科班、民族班等补偿力度较大,而报考省外院校、重点院校补偿力度相对较小,且加分只能用于投档,不用于录取,这使得民族补偿政策在保障少数民族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鉴于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国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青海大学、宁夏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等被纳入“211工程”院校,正是近年来国家出于平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薄弱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为西部各族学生提供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所做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此外,由于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的竞争更多地是侧重于对高中学业成就及高考分数的考量,少数民族受到语言、文化、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汉族学生的学业仍有一定差距,这种激烈的竞争自然抬高了少数民族跨入重点院校的门槛。

从以上分析来看,即使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就读不同类型高校时仍与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这既有国家倾斜政策调控的影响,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割的现实、各类高校的招生特点,乃至族群文化的作用有关。

3. 优势少数民族家庭的获益

尽管总体上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然偏低,但从对少数民族样本的专门分析来看,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是如此。家庭环境的内部地位分化已经对其子女进入层次更高、质量更佳的高校产生了影响,那些拥有良好家庭环境的少数民族子女总能优先获得进入这些高校的机会。

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当属父母的文化程度,那些拥有高学历的父母顺利地将其自身的文化优势承继到子代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获得当中,验证了家庭文化背景对少数民族子女也同样具备强大的影响力。以学历为载体凝结在父母身上的文化水平尽管不能直接传递给子代,但透过家庭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参与、激发子女学习动机等途径对子女的教育活动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产生了较为隐蔽却更加稳定的入学资本。由于教育活动本身具有显著的文化性特征,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更善于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本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从而不仅帮助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且是获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此外,父母职业阶层地位虽然对少数民族子女本科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影响,但中间阶层子女仍比基础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院校的概率高出1.395倍;相比之下,父母拥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其子女并未显露出特别的优势。从本文定义的“中间阶层”包含的各种职业类型来看,他们大都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接受过专业化训练,但之所以在控制父母教育程度之后,职业阶层仍对其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教养、意识形态、周边文化资源与当前的学校教育有关,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保持着高度一致,为其子女提高学业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与文化氛围,为其进入重点大学提供了布迪厄所说的“含糊性和明示性的两种帮助”。^[12]

尽管同属少数民族群体,但族群身份带给个体的影响有着巨大差异。从现实情况来看,那些拥有优势家庭背景,来自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由于与汉族群体高度融合,对主流现代化学术文化更加熟悉,族群语言文化差异为其学业成就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少甚至消弭,能够更好地避免族群身份对其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他们具有更好的家庭背景,使其更善于运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获得汉族成员无法获取的制度性资源(如少数民族入学倾斜政策)。

综合而言,那些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民族成员不仅可以在民族群体内部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的掌控权,甚至可以通过利用民族身份的政策优势以及打破民族特性的不利因素,在与汉族成员的竞争中获胜。对于那些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文化资源匮乏家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应对族群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双重挑战。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民族身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外,更要细致分析民族群体内部复杂的社会分层结构,致力于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政策体系。

注释:

① 为了避免院校性质可能附带的影响,该部分的一般本科院校不包括民办本科院校。

参考文献:

- [1] 谭敏,谢作栩. 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J]. 高教探索,2009,(2):26-31.
- [2] COLEMAN J 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 1968,(1):7-22.
- [3] FEJGIN 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Academic Excellence of American Jewish and Asian Student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5,68(1):18-30.
- [4] WILLIAM J, WILSON.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 马丁·N·麦格. 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2-33.
- [6] MEHAN H, HERTWECK A, MEIHIS L J. Handicapping the Handicapped: Decision making in Students' Educational Career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 [7] HEATH S B. Ways with Words: Language, Life, 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 [8] 科普林, 格德沙尔德. 民族分层[M]//马戎.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168-190.
- [9] 滕星,马效义. 中国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教育平等[J]. *民族研究*,2005,(5):10-18.
- [10] 谢作栩,谭敏. 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0):30-35.
- [11] 李倩. 重点大学高考招生民族倾斜政策与边疆社会稳定之研究[J]. *湖北招生考试*,2007,(4):44-51.
- [12] 布迪厄.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6-37.

(本文责任编辑 许宏)

• 高等教育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

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张红峰 导师 谢安邦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答辩时间 2010年

本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切入,运用博弈的理论和分析范式,沿着价值、结构、权力政治三个视角中的动态路径,对大学组织变革中的博弈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充分把握价值选择层面、组织内部各利益实体、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采取的策略选择,利用理论推演或模型分析求得博弈的均衡所在,并在期望“纳什均衡”的引导下,调整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策略和行动规则,从而为重构大学组织秩序形成思路,也开拓了用博弈理论研究大学组织的崭新领域。大学组织中利益的生成与表达存在着不确定性、被导向性、比较性以及互动性等特征要素,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利益本身存在着“超越经济理性”的一面。大学组织的利益结构中既有着冲突性和一致性特征,还表现为不同得益之间的共存,所以用博弈论分析大学组织变革中的问题,需要从利益关系、主体策略选择以及均衡出发,形成完整的博弈分析范式。

博弈理论思维下的大学组织是需要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的。在价值视角中,围绕着大学组织的价值关系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而其中历史和文化是大学组织价值选择过程形成博弈“聚点”时赖以说明选择行为动机的一种方式。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大学组织体现出“依附”的价值倾向,但是这一倾向必须建立在对学术内涵最大的包容和尊重上,必须要能体现出大学学术人员“心灵的良知”;组织发展中追求卓越的真实内涵应该是建立在对长远公平基础之上的卓越,管理文化中的效率思想也应是对自由和创造性探索充分思考

以后的价值选择。大学组织需要对传统的理性观点作重新思考,在结构视角中,工作权利的分配随着大学组织底层厚重的特质变得更加值得探讨。权利下放是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之间的权衡,同时权利转移的博弈数学模型分析应以基层院系“努力”作为一个协调期望策略,通过模型的数学求解洞察博弈的过程与根源所在。

在结构视角的协作环节,论文还分析了院系之间围绕资源配置的“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围绕“优异经验学习”的主题构成有限理性的进化博弈,通过协调博弈矩阵和构造动态微分方程,揭示了学科组织学习中的困境;论文也指出科际联合的矩阵结构中许多学术利益和资源利益冲突的成因。组织政治中的利益是分析任何组织情境政治维度的出发点,通过组织中的身份来表达,而权力则是组织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维度。从对大学组织中权力的语义辨析中,认为当前权力研究话语的批判者借助于自我建构的权力体系试图充实、完善大学组织中的权力理论,但消解以后的重构依然是建立在语义不清的基础之上,所以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主语”式的大学组织权力所形成的结构。权力的体现与联盟的形式密切相关,通过对大学教授评议会中夏普利值的测定,看出联盟投票权分配方式导致了参与式民主和授权的幻觉。从大学组织中的各种谈判现象可以发现,无论是价值创造还是价值索取,都可以通过类似于“标杆”或者“可信承诺”的策略,找到彼与此之间的解决办法。论文最后通过个案——P学院组织变革实践中的博弈现象分析,揭示了三个视角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并且在自然情境下验证了前面所阐述的理论分析。用博弈论对大学组织变革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求解,可以通过:第一,期望均衡下博弈聚点的不断调整;第二,遵循制度化的回应以及合作理性走出“困境”;第三,亦“此”亦“彼”,利用大学组织变革中协调策略找出彼与此之间相互的关联;最后依据博弈的机理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大学组织秩序。